

【经济体制改革】

# 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视阈下 中国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研究

徐志向 丁任重 张敏

**【摘要】**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表明,社会再生产顺利实现的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离不开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的动态匹配以及各要素和阶段的连续循环周转与世界市场。中国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质在于修复社会再生产的失衡,关键是要加快提高中高端消费资料生产部门的产品增速。当前,在具备优越经济条件的同时,依然在产业结构升级、要素流动、分配异质性、扩大消费等方面存在困境。只有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的重要机遇,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方向,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在更高水平上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才能推动实现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驱联动”的社会再生产动态匹配式平衡。

**【关键词】**社会再生产;新发展格局;消费结构;动态匹配

**【作者简介】**徐志向,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丁任重,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敏,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政治经济学评论》(京),2021.9.40~63

2020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时首次提出了“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科学论断。紧接着,5月23日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经济界委员联组讨论时、7月21日在参加企业家座谈会时以及7月30日在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时,习近平总书记都反复强调,未来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此后,又多次在重要场合对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的背景、内涵、重点等进行了深刻阐释,并提出了一系列极具针对性的要求。显然,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国内、国际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战略抉择。那么,在此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正确认识和把握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遵循和现实实践,形成科学有效的发展路径,对于我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顺利转危为机、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局之际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 一、理论遵循:模型演绎与内涵重识

马克思在研究社会总资本再生产时开宗明义地揭示,“总的再生产过程既包括资本本身的再生产过程,也包括以流通为中介的消费过程”,<sup>①</sup>分析社会再生产应当分析 $W' \cdots W'$ 这个流通公式,“在这里,消费必然会起作用;因为起点 $W' = W + w$ ,即商品资本,既包含不变资本价值和可变资本价值,也包含剩余价值。所以,它的运动既包括生产消费,也包括个人消费”,而“正是要通过说明这个总产品 $W'$ 的每一价值部分会变成什么,才能认识社会再生产的条件”。“在分析全年社会总产品的流通时,必须研究该产品各个组成部分的确定用途,即消费因素。”<sup>②</sup>因为,全部年产品价值最终必须由个人消费者和生产者来支付,即一部分作为资本来执行职能,另一部分作为收

人来消费。可见,生产和消费的同-性是社会再生产的核心。马克思就是在此基础上将社会总生产分成了两大部类,进而展开了对社会再生产实现条件的研究。

(一)模型演绎:实现条件与增长效应

考虑到社会扩大再生产是在简单再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且扩大再生产更加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所以下文将着重从扩大再生产的视角进行分析。先对基本符号做如下假定:(1)某经济体在第I期(初期)的社会总产品价值为Y,且第I部类占比为λ,第II部类则为1-λ。其中,第I部类总产品Y<sub>I</sub>=λY,第II部类总产品为Y<sub>II</sub>=(1-λ)Y;(2)两大部类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分别为C<sub>i</sub>、V<sub>i</sub>、M<sub>i</sub>;(3)两大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C<sub>i</sub>/V<sub>i</sub>=θ<sub>i</sub>;(4)两大部类的剩余价值率(价值增殖率)为M<sub>i</sub>/V<sub>i</sub>=M'<sub>i</sub>;(5)两大部类剩余价值的积累率为x<sub>i</sub>,则剩余价值中用于消费部分所占比例为1-x<sub>i</sub>,剩余价值中用于积累的量为x<sub>i</sub>M<sub>i</sub>,用于消费的量为(1-x<sub>i</sub>)M<sub>i</sub>。其中,i=I,II且0<λ,x<sub>i</sub><1。

根据假定,两部类划分下的生产恒等式可以表示为:

$$\text{两大部类:} \begin{cases} \text{第I部类: } C_I + V_I + M_I = Y_I \\ \text{第II部类: } C_{II} + V_{II} + M_{II} = Y_{II} \end{cases} \quad (1)$$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扩大再生产就是第I部类的资本家没有将剩余价值(M<sub>I</sub>)的全部作为收入消费(与C<sub>II</sub>相交换),而是将其中一部分转化为了用于自身扩大再生产的资本。这就要求,第I部类生产的生产资料在用于补偿两部类的简单再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以外必须还有剩余,同时要求第II部类生产的消费资料在满足两部类工人和资本家消费的同时也必须有余用于自身的扩大再生产以满足第I部类扩大再生产的需求。因此,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前提可以写为:

$$V_I + M_I > C_{II} \quad (2)$$

$$C_{II} + x_{II}M_{II} > V_I + (1-x_I)M_I \quad (3)$$

实现条件则为:

$$V_I + \Delta V_I + (1-x_I)M_I = C_{II} + \Delta C_{II} \quad (4)$$

式(4)表明,要想顺利实现社会扩大再生产就必须确保两大部类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而该比例关系又体现为扩大再生产的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

两个方面。

1. 规模效应:两部类生产规模的比例关系与积累率的决定

一方面,如果开端公式为V<sub>I</sub>+(1-x<sub>I</sub>)M<sub>I</sub>=C<sub>II</sub>,那么,两部类之间的产品比例满足:

$$\lambda = \frac{1}{\frac{(1 + \theta_{II} + M'_{II})(1 + M'_I - x_I M'_I)}{\theta_{II}(1 + \theta_I + M'_I)} + 1} \quad (5)$$

显然,式(5)反映出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第I部类的总产品在两大部类中所占的比例是由两大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价值增殖率,以及第I部类的积累率共同决定的,而与第II部类的积累率无关,且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第I部类的总产品在两大部类中所占的比例与第I部类的积累率和资本有机构成呈正向关系,与第II部类的价值增殖率呈负向关系。

同时考虑到第II部类的积累规模和积累率都是由第I部类的积累决定的,那么根据x<sub>II</sub>=(ΔC<sub>II</sub>+ΔV<sub>II</sub>)/M<sub>II</sub>的决定公式又可将x<sub>II</sub>表示为:

$$x_{II} = x_I \times \frac{M'_I B}{(1 - \lambda)\theta_{II} M'_{II} A} \quad (6)$$

其中,A=(1+θ<sub>I</sub>)(1+θ<sub>I</sub>+M'<sub>I</sub>),B=(1+θ<sub>II</sub>)(1+θ<sub>II</sub>+M'<sub>II</sub>),下同。

可见,在两大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价值增殖率以及产品总量已定的条件下,第II部类的积累率与第I部类的积累率呈正相关关系。

另一方面,如果V<sub>I</sub>+(1-x<sub>I</sub>)M<sub>I</sub>>C<sub>II</sub>,此时,两部类之间的产品比例以及第II部类的积累率分别可化简为:

$$\lambda = \frac{1}{\frac{B[1 + \theta_I + (1 + \theta_I - \theta_I x_I)M'_I]}{\theta_{II} A(1 + \theta_{II} + x_{II} M'_{II})} + 1} \quad (7)$$

$$x_{II} = \frac{\lambda B[1 + \theta_I + (1 + \theta_I - \theta_I x_I)M'_I]}{(1 - \lambda)\theta_{II} M'_{II} A} - \frac{1 + \theta_{II}}{M'_{II}} \quad (8)$$

显然,在V<sub>I</sub>+(1-x<sub>I</sub>)M<sub>I</sub>>C<sub>II</sub>的情形中,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两大部类生产规模之间的比例关系是由两大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价值增殖率以及积累率共同决定的。而且第II部类的积累率依然是由第I部类的积累决定,其中的逻辑在于,第I部类资本家不断积累更多剩余价值的根本动机决定了第I部类扩大再生产所追加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数量,从而决定了第II部类为及时补充第I部类扩

大再生产需要而追加的不变资本数量,进而也就决定了第Ⅱ部类所追加的可变资本的数量,最终决定了第Ⅱ部类的积累率。

## 2. 结构效应:两部类增长速度的比例关系及其决定

从马克思所讲的开端公式,即 $t_0$ 满足 $V_1+(1-x_1)M_1=C_{II}$ 的情形下来看,第1期结束后两部类的产出增长率分别为:

第Ⅰ部类的总产出增速:

$$g_I = \frac{x_1 M'_1}{1 + \partial_1} \quad (9)$$

第Ⅱ部类的总产出增速:

$$g_{II} = \frac{x_1 M'_1}{(1 + \partial_1)[1 + (1 - x_1)M'_1]} \quad (10)$$

由式(10)可以看出,两大部类之间的经济增速存在明显的联动关系。另外,由式(9)、(10)可得:  $\frac{g_{II}}{g_I} =$

$$\frac{1}{1 + (1 - x_1)M'_1} < 1, \textcircled{3} \text{ 也就是说在扩大再生产的第1期,}$$

第Ⅰ部类的总产出要比第Ⅱ部类的总产出增长得快。然而,需要说明的是,第Ⅰ部类增速快于第Ⅱ部类的结论仅限于在 $V_1+(1-x_1)M_1=C_{II}$ 的前提下,且扩大再生产进行了一期(调整期)时的情况,如果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扩大再生产,那么之后每一期两大部类的总产出及其各个构成部分的增速都将完全相同。模型推演如下:

假设 $t_i$ 期两大部类社会总产品的构成为:

第Ⅰ部类:

$$C_{Ii}^i + V_{Ii}^i + M_{Ii}^i = Y_{Ii}^i \quad (11)$$

第Ⅱ部类:

$$C_{IIi}^i + V_{IIi}^i + M_{IIi}^i = Y_{IIi}^i \quad (12)$$

并且满足:

$$V_{Ii}^i + (1 - x_1)M_{Ii}^i = C_{IIi}^i \quad (13)$$

一方面,由式(11)化简可得:

$$Y_{Ii}^i = C_{Ii}^i \times \frac{E}{\partial_1} = V_{Ii}^i \times E = M_{Ii}^i \times \frac{E}{M'_1} \quad (14)$$

其中, $E = 1 + \partial_1 + M'_1$ 。

显然,从式(14)可以看出,在第Ⅰ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和价值增值率一定的情况下,第Ⅰ部类总产品的增速与其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的增速完全相同,都满足式(9),而且该结论对于第Ⅰ部类在

进行了任意 $i(i \geq 1)$ 期扩大再生产后都成立。

另一方面,由式(12)和式(13)联立可得:

$$Y_{IIi}^i = C_{IIi}^i \times \frac{Z}{\partial_1} = V_{IIi}^i \times Z = M_{IIi}^i \times \frac{Z}{M'_1} \quad (15)$$

其中, $Z = (1 + \partial_{II} + M'_{II})[1 + (1 - x_1)M'_1] / \partial_{II}$ 。

由此可以看出,在两大部类资本有机构成、价值增殖率以及第Ⅰ部类积累率一定的条件下,第Ⅱ部类的总产出增速必然与第Ⅰ部类总产出的增速以及两大部类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的增速完全相同,同样都满足式(9)。当然,要想达到两大部类增速的相同总是离不开第1期的调整过程,所以此处应满足 $i > 1$ 。同时,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即便是在开端公式为 $V_1+(1-x_1)M_1 > C_{II}$ 的情况下,由于扩大再生产顺利进行的需要,第Ⅱ部类的资本家也总会及时抽取其剩余价值的恰当量以完全补充第Ⅱ部类需要补偿的不变资本,所以无论任何时候满足式(13)都是十分必要的。而且,事实上, $V_1+(1-x_1)M_1=C_{II}$ 的开端公式在经历了1期扩大再生产后就会自然变成 $V_1+(1-x_1)M_1 > C_{II}$ 的情形, $\textcircled{4}$ 也就是说 $V_1+(1-x_1)M_1 > C_{II}$ 才是扩大再生产的常态。

## 3. 四部类划分下社会再生产的增长效应

马克思将第Ⅱ部类内部的产业部门划分为必要消费资料的生产部门(记为 $II_a$ )和奢侈消费资料的生产部门(记为 $II_b$ )的同时,又进一步将第Ⅰ部类做了相应划分:必要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记为 $I_a$ )和奢侈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记为 $I_b$ )。 $\textcircled{5}$ 由此,便产生了四部类的社会再生产。如果假定各部类工人收入中用于生活必需品消费的份额为 $p$ ,则用于奢侈品消费的份额为 $1-p$ , $\textcircled{6}$ 各部类资本家消费总额中用于必要消费资料的比重为 $q$ ,则用于奢侈消费资料的比重为 $(1-q)$ 。其中, $0 < p, q \leq 1$ 。

那么,在 $V_1+(1-x_1)M_1=C_{II}$ 的条件下,按照徐志向和丁任重的研究假设与研究结论, $\textcircled{7}$ 四部类总产出增长率分别为:

$$g_{I_a} = g_{I_b} = g_I = \frac{x_1 M'_1}{1 + \partial_1} \quad (16)$$

$$g_{II_a} = \frac{x_1 M'_1}{1 + \partial_1} \times \frac{k}{1+k} \times \frac{1}{p + qE_1} \quad (17)$$

$$g_{II_b} = \frac{x_1 M'_1}{1 + \partial_1} \times \frac{1}{1+k} \times \frac{1}{1-p+(1-q)E_1} \quad (18)$$

其中,  $k$  代表第 I 部类中两个分部类的社会总产品比例, 即  $k = \frac{Y_{Ia}}{Y_{Ib}}$ 。  $\varepsilon_i = \frac{M_i - a_i}{V_i}$ ,  $a_i$  为第 I 部类剩余价值中用于积累部分的绝对数量, 则  $\varepsilon_i$  代表第 I 部类资本家绝对消费量与工人绝对消费量的比值。

我们已经知道, 虽然在工业化时期“生产资料有限增长规律”总会导致  $g_I > g_{II}$ , 但社会再生产良性循环的趋势则是  $g_I = g_{II}$ 。因此, 通过式(16)—(18)可以看出, 在工业化中后期, 随着消费升级的出现,  $p$ 、 $q$  必然呈现出下降趋势, 则在  $x_I$  和  $M'_I$  相对稳定的情况下, 实现良性循环的逻辑就在于: 相对降低  $g_I$  ( $g_{Ia} = g_{Ib} = g_I$ ), 相对增加  $g_{IIa}$ ,  $g_{IIb}$  相应发生改变。这就要求, 首先是增加  $\partial_I$ , 其次是降低  $k$  和  $\varepsilon_i$ , 再次  $g_{IIa}$  随之发生相应变动。

总之, 根据以上模型推演可以得出结论。(1) 社会总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具有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 且两大部类之间时刻存在联动关系。假定资本有机构成、价值增殖率已定, 那么两大部类生产规模之间的比例关系以及第 II 部类的积累率都取决于第 I 部类的积累率。(2) 不论扩大再生产的开端公式如何 (只要满足  $V_I + M_I > C_{II}$ ), 在进行了 1 期的调整后, 两大部类总产出增速以及各部类产品价值构成要素的增速全都相同且等于第 I 部类的总产出增速。(3) 在工业化中后期, 随着消费升级的出现, 要想保持社会再生产良性循环, 关键核心在于提高第 I 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第 I 部类中生产奢侈品的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的总产品相对占比、提高第 I 部类中工人的绝对消费量。

## (二) 内涵重识: 过程性、连续性和世界性

事实上, 马克思对社会再生产理论的研究并不只是局限于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 即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层面, 而是贯穿了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整个过程。所以, 从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整体性内涵来看, 还理应包括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所应具备的过程性、连续性和世界性, 具体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 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离不开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的辩证统一。马克思认为, 社会再生产的总过程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相互联系的环节构成, 其中“生产表现为起点, 消费

表现为终点, 分配和交换表现为中间环节”。<sup>⑧</sup> 具体关系表现为: 一是生产与消费、分配、交换之间的直接同一性。生产过程中对生产要素的消费体现为生产直接是消费, 而产品的消费则体现为劳动力的再生产; 生产要素的分配 (包括生产工具和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 作为生产的前提, 决定着生产的结构和产品的分配; 生产要素在各种不同生产之间的交换也包含在直接生产过程中。二是生产与消费、分配、交换之间的相互作用。生产决定消费的对象、方式、需要等, 而消费则使生产的产品得以最终实现, 并创造新的生产需要、动机、目的; 生产决定分配的对象和形式, 产品的分配则可以激励生产、引导要素流动、影响生产效率; 生产决定交换的社会性质、深度、广度和方式等, 而交换范围扩大又会促进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分工的细化。三是消费与分配、交换之间的相互作用。消费程度决定可供分配的价值总量, 分配的关系反过来又通过影响消费力而决定消费的程度; 消费为交换提供目的和动力, 消费的水平、结构和方式决定着商品交换的规模、结构和方式, 而交换又是消费必不可少的中介要素, 交换影响消费的对象和结构。

其次, 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离不开总生产过程每个要素和阶段的连续循环。马克思指出: “总生产过程同时就是再生产过程, 从而是总生产过程的每一个要素的循环——这对总生产过程来说, 特别是对社会资本来说, 是一个必要的条件。”<sup>⑨</sup>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 资本在它的任何一种形式和任何一个阶段上的再生产都应是连续进行的, “连续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sup>⑩</sup> 这种连续性离不开总生产过程各个环节在时间上的继起和空间上的并存。一方面, “产业资本的连续进行的现实循环, 不仅是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的统一, 而且是它的所有三个循环的统一”。<sup>⑪</sup> 此处的“三个循环”指的是货币资本的循环、生产资本的循环以及商品资本的循环, 这三个循环是过程的连续性借以表现的不同形式, 只有在三个循环的统一中才能实现总过程的连续性, 即资本的每个不同部分必须依次经过相继进行的各个循环阶段, 既不能跨越也不能停滞不前。另一方面, 资本每一部分在时间上的相继进行又是由各部分在空间上

的并列存在即资本的分割所决定的,“资本的分割必须按一定的比例数字进行”,<sup>⑫</sup>如果分割比例不合理就会对循环的连续性造成干扰。总之,资本作为整体必须同时、在空间上并列地处在它的各个不同阶段上。同时,马克思还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再生产的连续性难免有时会或多或少地发生中断,造成中断的原因包括货币回流滞后、价值总量在不同阶段和职能形式中分配比例出现偏差,以及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等。

最后,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离不开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马克思曾鲜明地指出:“正是市场——交换者——和资本之间的比例失调,某个国家生产上的比例失调,把[资本]推向世界市场,也从一个市场推向另一个市场。合乎比例的生产……在现代产业的条件下,为了通过生产以引起对应的生产从而引起实际的需求,的确需要整个地球。”<sup>⑬</sup>所以,不断开拓世界市场是使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失衡得以修复的重要基础。马克思在分析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时发现,如果出现第Ⅱ部类不变资本中每年需要用实物更新的固定资本组成部分与第Ⅱ部类不变资本中另一个固定资本组成部分的年损耗不相等时(这种情况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毫无疑问都会出现),就会存在失衡的问题,而问题的解决则必须依赖对外贸易。<sup>⑭</sup>不论是需要更新的固定资本占比很高(技术进步)还是需要更新的固定资本占比不高,“在两个场合,对外贸易都能起补救作用;在第一个场合,是使第Ⅰ部类保留货币形式的商品转化为消费资

料;在第二个场合,是把过剩的商品销售掉”。马克思还特别强调:“商品来源的全面性,市场作为世界市场的存在,是产业资本流通过程的特点。”<sup>⑮</sup>尤其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全球经济一体化作为必然趋势和必然结果,不仅不可逆转,而且将日益加深。

(三)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循环图式:理论基础和现实指导

综上所述,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充分考虑两大部类(或四大部类)之间的双向动态匹配关系,而这一动态匹配又离不开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之间的“四驱联动”以及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辅助。具体可将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视阈下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循环图式呈现为如图1所示。

一方面,图1所呈现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循环图式为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循环①代表某经济体社会再生产两大部类之间的辩证关系,即“第一部类起主导作用,而消费品的生产归根到底表现为生产资料生产的界限”;<sup>⑯</sup>循环②代表某经济体社会生产总过程中四个环节之间的辩证关系,即“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sup>⑰</sup>循环③代表任何一个经济体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都离不开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

另一方面,图1中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循环图式还可以为推动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现实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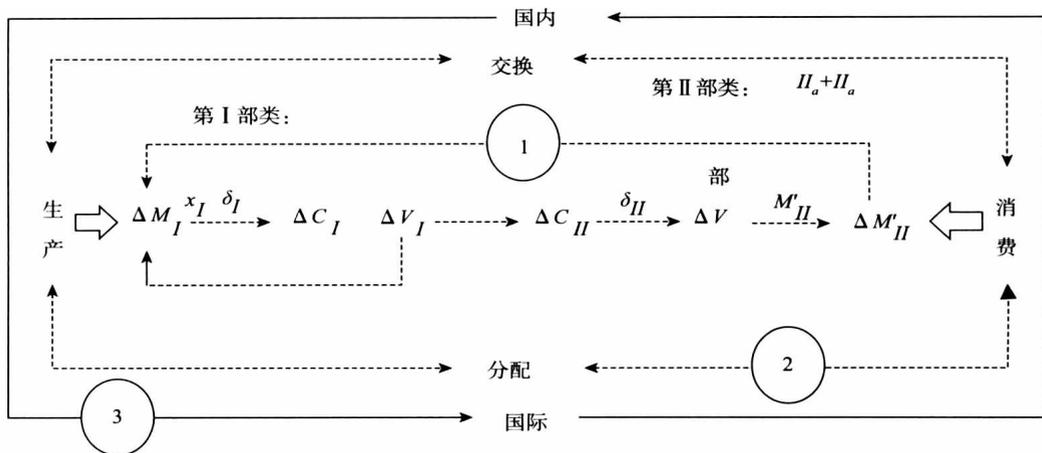


图1 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循环图式

践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具体体现为：循环①——“发现问题”——可以为我国社会再生产是否顺利进行提供科学的评判标准；循环②——“分析问题”——可以为我国社会再生产失衡的病理学诊断提供方向；循环③——“解决问题”——可以为我国社会再生产失衡的修复提供思路。因此，下文将着重基于这一分析逻辑对我国社会再生产的现实实践进行系统研究。

## 二、现实镜鉴：经济条件 and 实践困境

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表明，生产关系的变革要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为基准，这对中国推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指导作用在于要始终联系社会发展阶段研究社会再生产，进而研究新发展格局。鉴于此，有学者指出，“双循环”的提出背景应该从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下行的整个过程来分析，内循环为主与稳中求进、扩大内需的方针是一脉相承的。<sup>⑩</sup>然而，事实上，早在20世纪末中国就已提出了要坚持实行扩大内需的方针，努力增加有效需求。可见，如果从“双循环”与“扩大内需”之间的承接关系来考虑，那么关于“双循环”的提出背景理应从20世纪末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时间维度加以考察。

### (一)1990—2018年中国社会再生产的特征性事实

本文以张忠任的研究方法为基础，<sup>⑪</sup>对两大部类的价值构成进行了估算。所用数据来自中国投入产出学会公布的1990—2018年中国的13个投入产出

表。需要说明的是，在具体的数据处理过程中会面临一个问题，即在传统的以投入产出表为基础的两大部类估算方法中，各部门总产出中的进口和出口因素并未予以考虑。然而，在实际统计中，投入产出表包含了每一部门的进出口数据(1990年、1992年和1995年仅包含净出口额)。因此，本文还需要对具体方法做进一步的补充说明。

本研究将各部门总产出中的进出口部分计入最终产品的“积累”中，这样各部门最终产品的“消费”部分仅由“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构成。原因在于，一方面，实际投入产出表中的进出口统计数据实际上是未经处理的原始数据。换言之，单从这些数据无法得知每个部门中有多少出口产品是用于国外生产的中间产品，有多少是用于资本形成和国外消费，对于进口数据同样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实际上进出口数据只占最终产品的很小一部分，如果要将进出口部分包括在“积累”中，只需要在原有数据结构的基础上加上净出口，因为后者所占比例很小，所以不会对本研究的分析结论产生太大影响。此外，还需要说明的是，在新创造价值中，劳动报酬对应投入产出表中的“劳动者报酬”，社会纯收入对应于投入产出表中的“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计提折旧)”和“营业盈余”之和。在此基础上，就可以根据张忠任的方法估算出1990—2018年中国两大部类的价值总量和价值构成等相关数据，<sup>⑫</sup>具体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1990—2018年中国两大部类相关指标数据

年份	第I部类				第II部类				部类比
	$\theta_1$	$M'_1$	$Y_1$ (亿元)	$g_1$ (%)	$\theta_{II}$	$M'_{II}$	$Y_{II}$ (亿元)	$g_{II}$ (%)	$\frac{\lambda}{(1-\lambda)}$
1990	3.545	1.333	31554.7	—	2.001	0.774	10658.8	—	2.960
1992	4.289	1.504	51872.9	28.215	2.053	0.704	16591.1	24.762	3.127
1995	4.008	1.274	121516.8	32.810	2.289	0.807	35028.1	28.286	3.469
1997	3.405	0.935	155340.4	13.064	2.015	0.559	44503.8	12.717	3.490
2000	3.875	0.983	201475.9	9.055	2.057	0.556	56076.8	8.010	3.593
2002	3.955	1.233	241739.3	9.537	1.865	0.740	71691.2	13.068	3.372
2005	5.576	1.585	444939.4	22.551	2.266	0.859	97822.7	10.915	4.548
2007	6.027	1.599	687115.4	24.269	2.393	0.941	131743.5	16.050	5.216
2010	5.374	1.255	1055958.4	15.400	1.999	0.740	196686.5	14.292	5.369
2012	4.871	1.175	1329908.5	12.224	1.929	0.675	271718.6	17.536	4.894
2015	4.817	1.044	1718412.6	8.919	1.878	0.624	363033.9	10.139	4.733
2017	4.007	1.053	1813556.5	2.731	1.898	0.683	444177.0	10.613	4.083
2018	3.959	1.060	1999729.0	10.266	1.808	0.664	495769.3	11.615	4.034
均值	4.439	1.233	757932.3	15.972	2.035	0.717	171961.6	14.698	4.068

首先,从规模效应视角来看。表1显示,第I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长期大于第II部类,这就表明,中国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技术性要显著高于消费资料的生产部门,由此也就造成了第I部类的总产出规模明显大于第II部类的现象,并且社会总产出在两部类之间的规模分配存在一定的波动性,当然这与中国该时期处于快速而深刻的资本深化和工业化进程有关。<sup>⑧</sup>此外,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况下,同时考虑到 $V_I + (1-x_I)M_I > C_{II}$ 的一般性,可以根据上文中社会再生产均衡的条件,即式(9)和式(8)测算出 $x_I$ 和 $x_{II}$ 的数值,同时与历年投入产出表中的总的积累和总的社会纯收入之比,即现实的投资率或积累率进行比对,就可以检验中国社会再生产是否处于均衡状态。结果如图2所示,从中可以看出,均衡假定下测算出来的中国两部类平均积累率与现实积累率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反映出中国社会再生产确实存在

失衡问题。而且仅从数值上来看,现实积累率处于 $[0, 1]$ 的区间之内,而均衡假定下的两部类积累率以及两部类平均积累率均超过了该区间范围,因此,中国两部类社会再生产存在长期失衡现象。

其次,从结构效应视角来看。如图3所示,中国两部类总产出增速存在一定差异且波动性较大,但总体上呈现出了很强的协同性变化趋势。具体地,两部类均表现出了“先降后升再降”的周期性特征,且2010年之前,第I部类增速大于第II部类,之后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实施了大量刺激消费的政策,加之新常态时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效应,第I部类增速大幅下降,2010年以后第II部类的增速开始大于第I部类,直至2018年二者才出现趋于一致迹象。进一步分析还会发现,中国经济运行最为突出的特征是,高资本有机构成往往对应着高增速,也就是说,两部类资本有机构成的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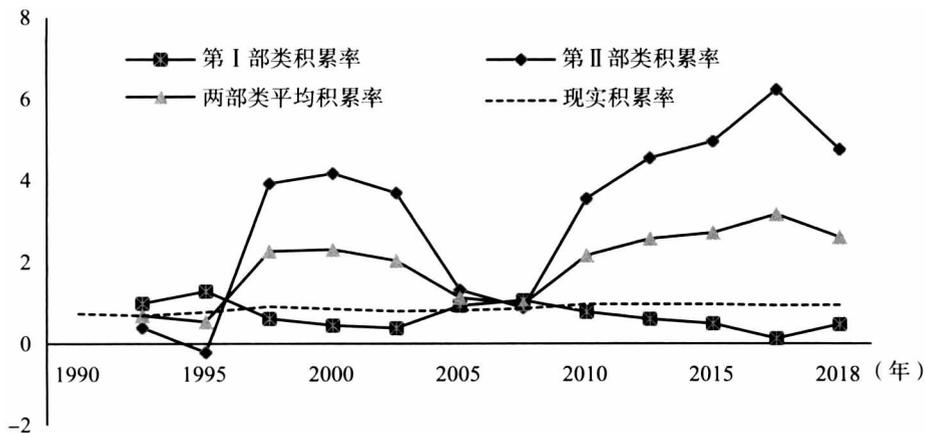


图2 均衡假定下两部类积累率与现实总的积累—利润比的对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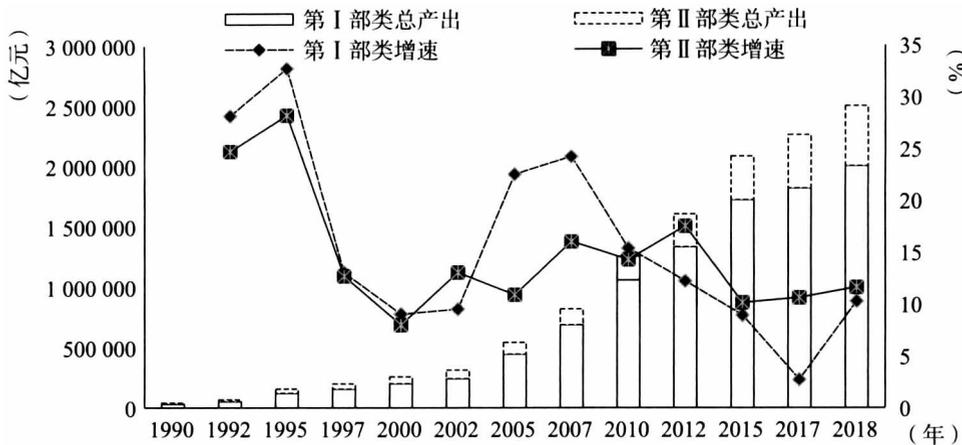


图3 两大部类历年总产出与增速变化

异与高波动性是增速差异及波动的最主要原因。第Ⅱ部类增速相对较低的大部分原因在于资本有机构成相对较低,而第Ⅰ部类资本有机构成的持续大幅波动又造成了第Ⅰ部类总产出增速的剧烈波动。当然,该结果是以现实中两部类的价值增殖率的相对稳定为前提的。

最后,从国际视角来看。按照赵峰等根据投入产出表测算的2000—2010年中国两部类进出口的相关数据,21世纪初期中国两大部类进出口规模与结构同样存在较大差异<sup>②</sup>。图4显示,第Ⅰ部类的进口和出口总额显著高于第Ⅱ部类。特别是2005年以后,随着第Ⅰ部类进口和出口总额(尤其是出口额)的急剧上升,尽管第Ⅱ部类的出口额经历了2005—2007年的短暂下降后与第Ⅰ部类出口额呈现出了平行增长的态势,但两部类之间的进出口差异依然很大。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两部类增长早就出现了失衡现象。此外,从两部类的净出口都在不断攀升的趋势中还可以看出,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与中国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现象不无关联。总之,现实已然充分表明,中国社会再生产存在着明显的失衡问题。

### (二)我国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经济条件

针对我国社会再生产中的失衡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从生产、交换(流通)、分配、消费各个领域采取了一系列解决措施,成效显著,为新时期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提供了优越的经济条件。具体体

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就生产领域而言,产业体系日臻完备,生产能力显著提升。自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我国经济长期持续保持中高速发展态势,产业结构日趋合理化和高级化,<sup>③</sup>具体表现为农业生产布局和工业结构持续优化,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sup>④</sup>推动形成了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现代化工业体系,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同时,世界工厂和制造业中心的国际产业链定位充分彰显了我国的庞大制造和生产能力,<sup>⑤</sup>而生产能力的提升还体现为创新势头的强劲。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以2005年为基期,2018年中国创新指数为212,平均每年实现了6%的高速提升,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成效各个领域都得到了极大改善,2019年中国科技进步贡献率达59.5%,比2010年提高了16.9%。

其二,就交换(流通)领域而言,体制机制不断完善,流通规模大幅提高。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而“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sup>⑥</sup>2015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推进国内贸易流通现代化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意见》提出了“到2020年,基本形成规则健全、统一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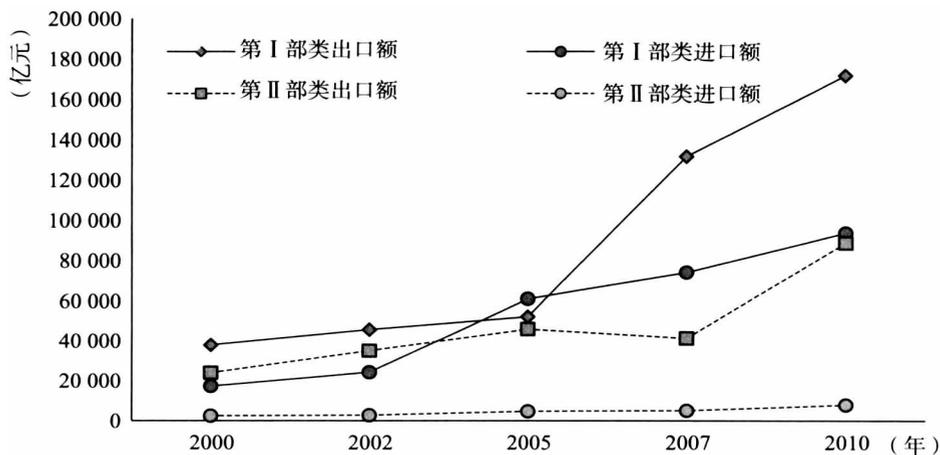


图4 2000—2010年中国两大部类进出口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赵峰、赵翌辰、李帮喜:《马克思两大部类模型与中国经济的宏观结构:一个经验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放、竞争有序、监管有力、畅通高效的内贸流通体系”的目标。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进一步对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各生产要素市场的发展、价格市场化改革、运行机制等提出了详细建议。在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随着体制机制日趋完善,我国业已形成了多元化、多样化、多层次的超大规模流通体系。

其三,就分配领域而言,人民收入水平提高较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分配包括生产要素的分配和劳动产品的分配两个方面。我国生产要素的分配总体上是适合我国发展要求的。<sup>②</sup>劳动产品的分配方面,我国已经进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并接近高收入国家,人民收入不断提高、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3—2019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8311元增加到了30733元,每年平均增速高达9%。其中,人均可支配工资性收入由10411元增加到了17186元,每年平均增速高达8.7%。此外,2020年不仅是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的实现之年,也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之年,<sup>③</sup>标志着中国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都将显著提升。

其四,就消费领域而言,需求市场不断扩张,消费能力日益增强。2000年以来,我国最终消费规模持续攀升,2019年最终消费总额较2000年增加了7.66倍,需求市场不断扩张,目前已经形成了拥有14亿人口的巨大需求市场。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消费在拉动我国经济增长方面长期处于主导地位,且拉动作用不断提升。此外,从消费的构成来看,一方面,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重稳定保持在70%左右,且居民消费中城镇居民消费占比不断增加,2018年达78.2%,从而反映出居民消费(尤其是城镇居民消费)在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以2010年为分界点来看,生产性消费(即投资)占比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变化态势,而生活性消费则表现出了“先降后升”的趋势,进而表明2010年以来我国居民的生活性消费能力不断上升。

(三)我国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现实困境  
着力打通生产、交换(流通)、分配、消费四个环节

的关键就在于明确各个环节所存在的关键问题。当前,囿于经济发展所处转型升级阶段的现实约束,我国分别在生产、交换(流通)、分配、消费四个环节遇到了以下“四重困境”。

第一,生产困境:产业结构升级乏力。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后,生产领域存在的问题包括供给能力下降、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创新驱动不足、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生产和投入效率不高等诸多方面,<sup>④</sup>而这些问题的核心就在于产业结构升级乏力。当前,我国产业“大而不强”现象凸显,产业附加值总体较低、产业基础相对薄弱、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现状短期内难以改变。<sup>⑤</sup>洪银兴教授认为,我国的制造业处于低端水准,突出表现在科技含量上,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引擎是创新,突出表现在产业化创新上。<sup>⑥</sup>从国际视角来看,上述分析已经表明,长期以来,我国第Ⅰ部类的出口额远大于进口额和第Ⅱ部类的进出口额,加之第Ⅰ部类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所以很容易受到金融危机、贸易保护主义与新冠疫情等外部突发事件的影响。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在整体上提供服务增值和价值创造的能力较弱,在全球价值链中主要承担下游环节,而这些环节价值增值能力较低,盈利能力较差,面临一定程度的低端锁定状况。<sup>⑦</sup>

第二,交换(流通)困境:要素流动不充分不合理。目前,我国流通体系现代化程度仍然不高构成了社会再生产受阻的重要因素。2020年5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明确指出,“我国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完全理顺,还存在市场激励不足、要素流动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微观经济活力不强等问题”。<sup>⑧</sup>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关键要素的流动问题。关键要素流动受政府干预较大,不同所有制企业获取关键要素资源的能力存在体制性差异,<sup>⑨</sup>而且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的要素流动也存在一定的异质性。一是劳动力和人才流动方面,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就业结构失衡、区域间不公平竞争、档案管理服务滞后等问题突出,主要原因在于户籍制度、兜底保障机制、用人制度、评价激励机制等仍不完善。

二是资金流动方面,经济“脱实向虚”现象凸显。在利润平均化的过程中,金融资本在各行业间的择优投资行为,以及资本的不完全流动,共同导致了金融业的高利润。<sup>⑤</sup>三是信息流动方面,数字经济时代信息监管体制机制不完善,数据保护和流动规则不健全,垃圾信息泛滥。

第三,分配困境:分配异质性尚存。从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来看,两部类之间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必须及时充分弥合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一方面,从生产要素分配的视角来看,存在盲目投资导致产能过剩的问题,这也是近年来我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从劳动产品的分配视角来看,“橄榄型”分配格局尚未形成。2000—2019年我国基尼系数虽整体呈下降趋势,但一直处于大于0.4的水平,表明我国收入分配尚存较大改进空间。具体从城乡、区域、行业之间的差异来看,如表2所示,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农村的2.7倍;二是东部与中西部地区收入差距较大,中部与西部地区收入差距则相对较小;三是金融业和信息业与农业和制造业行业之前的收入差距较大。

第四,消费困境:有效需求不足与消费结构畸形。首先,从总体来看,现有研究表明,无论是进行同期比较,还是在相同的人均GDP水平上进行比较,中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是偏低的,既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也明显低于中国周边的代表性国家。<sup>⑥</sup>而且,虽然我国的潜在市场需求规模庞大,但

由于尚有42.9%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还很低,真正的现实有效市场需求规模还相对有限。<sup>⑦</sup>其次,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正在加快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进而向享受型转变,<sup>⑧</sup>然而,从我国社会再生产的特征性事实来看,第I部类的出口额远远高于进口额和第II部类的进出口额,这种随着消费需求的不断升级而呈现出的中低端工业制成品过剩与中高端消费供给严重不足并存的现象逐渐凸显。最后,消费结构畸形严重。一是生产性消费,即投资的方向和结构不合理,不仅存在“脱实向虚”,而且结构性不足过剩并存;二是生活性消费结构不合理,奢侈品消费的规模远远低于生活必需品;三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随着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包括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的持续下滑,国外需求比重不断下降。

### 三、路径选择:关键环节和政策建议

本文在重视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深刻内涵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现实,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进行了系统研究。分析结果表明,(1)“双循环”发展格局旨在推动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而社会再生产本身具有的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内在要求社会再生产离不开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个环节的“四驱联动”,离不开总生产过程每个要素和阶段的连续循环以及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2)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再生产就存在失衡现象,主要是生产端对外贸易依存度(特别是出口依存度)过高和消费端动力不足,具体表现为第I部类总产出规模和增速明显大于第II部类,原因则在于高资本有

表2 2013—2019年分城乡、分区域、分行业收入分配情况 (单位:元)

年份	分城乡		分区域			分行业			
	城镇	农村	东部	中部	西部	农林牧渔	制造	金融	信息
2013	26467	9430	25391	15495	13624	25820	46431	99653	90915
2014	28844	10489	27813	17074	15041	28356	51369	108273	100845
2015	31195	11422	30212	18550	16546	31947	55324	114777	112042
2016	33616	12363	32774	20038	18066	33612	59470	117418	122478
2017	36396	13432	35651	21740	19795	36504	64452	122851	133150
2018	39251	14617	38670	23575	21599	36466	72088	129837	147678
2019	42359	16021	41936	25653	23619	—	—	—	—
均值	34018	12539	33207	20304	18327	32118	58189	115468	117851

注:(1)城乡和东中西三大地区的统计数据为人均可支配收入,并且东中西部地区历年数据为所包含省级行政区的均值,行业统计数据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2)所有数据均四舍五入,保留整数。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整理或计算所得。

机构成往往对应着高增速；(3)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社会总生产各个环节都做了相应改革和调整，成效显著，但囿于结构转换的阶段性特征，依然存在产业结构升级乏力、要素流动不充分不合理、分配异质性尚存以及有效需求不足与消费结构畸形“四重困境”。

总之，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视角来看，中国社会再生产失衡修复的核心在于加快提高消费资料（特别是中高端消费资料）生产部门的生产速度。这就要求，一方面要提高为生产中高端消费品提供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的增速和相对比重，主要手段就是技术创新，即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另一方面要提高劳动者的绝对消费量。显然，这其中蕴含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消费的双重政策含义。同时，鉴于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离不开生产、交换（流通）、分配、消费之间的动态匹配过程以及世界市场，所以得出新时期推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环节如图5所示。因此，本文也将着重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以及开拓世界市场五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第一，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要机遇，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产业链升级和维护产业链的安全是当前我国生产领域面临的两大核心问题，二者的辩证关系体现为产业链升级有利于保障产业链的安全，而产业链的安全又为产业链升级提供了必要条件。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高速发展，为我国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重要契机。首先，要加快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人才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一资源，在我国长期存在流失严重和结构畸形的问题。应尽快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努力培养科技工作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同时，要加快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明确人才引进机制，努力用

好国际国内两种人才资源，切实做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其次，要努力打通科技和经济转移转化的通道，尽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一是要充分发挥政府的激励和保障作用，当务之急是尽快完善产权制度、专利制度和融资制度。二是要坚持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并发挥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基础研究能力。企业作为市场信息最快和最直接的接收者，应始终以企业的创新应用需求为导向，引导大学和科研机构发挥在核心技术攻关方面的优势。三是要加快形成全方位的创新协同效应。要充分借助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的发展，积极组建“互联网+”联盟、高端芯片联盟，加强战略、技术、标准、市场等领域的沟通协作，加快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最后，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应始终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原则。一是要依靠科技创新，加快向产业链高端迈进，持续推进以现代服务业为主、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先进制造业支撑的新型产业体系建设。二是要充分考虑到我国区域之间发展条件和发展阶段的异质性，实施因地制宜的创新扶持政策，发挥东部地区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三是坚持绿色发展的科技和产业变革导向，特别是在水资源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领域要科学运用绿色科技的重要手段。四是要坚定不移秉承国内自主创新、国际协同创新的发展模式，既要树立自力更生的创新意识，也要努力用好国际国内两种科技资源，积极参与国际创新交流与合作。五是要始终坚持科技创新应以满足人民需求为根本导向，实现创新成果由人民共享。

第二，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完备的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任务之一，在国民经济中发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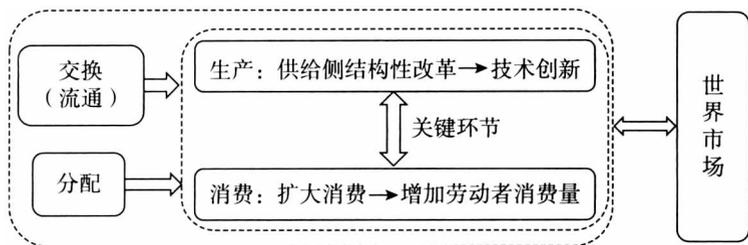


图5 推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环节

着基础性作用。首先,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规范市场秩序,完善政府职能。一是要积极稳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和自然垄断行业改革,为非公有制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在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目标指引下,规范有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提高自然垄断行业的供给质量,依法破除行政性垄断。同时,要加强非公有制企业的融资增信支持力度,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二是要加快完善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包括产权制度、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等,以规范市场秩序,保障公平竞争。三是要创新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特别是要创新宏观调控机制,借助新技术丰富调控手段,增强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其次,要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改革,努力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一是土地流动方面,要建立健全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深化产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鼓励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完善土地管理体制。二是劳动力和人才流动方面,要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提供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增加就业创业渠道,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三是资本流动方面,要加快建立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完善股票市场,发展债券市场,加大重点外资项目支持服务力度。四是技术和数据流动方面,既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又要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形成“技术+数据”的有效融合发展。最后,要尽快扭转经济“脱实向虚”局面,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实体经济作为国家经济的立身之本,必须拥有充足的资金支持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过去一个时期,资金流向虚拟经济现象明显,不仅增加了系统性风险,而且限制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当前,伴随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强劲势头,在大力发展智能制造的同时,应尽快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的优质项目。

第三,提高收入水平,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收入分配异质性是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现象,而尽可能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是实现消费扩大的根本动力。首先,要进一步提高劳动者收入,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的数量。一是

要全面高质量决胜脱贫攻坚。只有切实解决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两不愁三保障”问题,才能为扩大消费打下基础。而脱贫工作的重点则在于精神脱贫的长期性和精准脱贫的靶向性。二是要尽快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针对我国目前拥有的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和9亿多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的关键就在于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渠道,主要手段就是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就业吸纳能力。三是要努力调节城乡、区域、部门间的分配差距,即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为契机,提高西部地区收入;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契机,提高农业、制造业、工业等行业的收入。其次,要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一是要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二是要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强化税收调节,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三是要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最后,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继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一是要切实建立健全覆盖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住房等直接关系人民生活水平的制度体系,尽快推动形成“一体化”管理的高效模式。二是要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特别是在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范和治理、公共卫生服务、重大疾病救助等重点方面要尽快加以完善。三是要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重点在于覆盖全面、质量达标、责任明晰、机制创新四个方面。

第四,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长期以来,我国始终面临供给与需求错配问题,新时期在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的前提下,在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完善市场体系和收入分配制度的基础上,应着重推动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一方面,要以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为战略基点。收入分配制度的完善终究是为提高劳动者收入服务的,而提高劳动者收入的目标则在于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首先,要改变消费者的传统消

费观念和消费倾向,提高劳动者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受传统观念影响,当前国内部分地区和群众依然保持着“收支相抵,略有结余”的消费倾向,对信用消费、超前消费等新型消费方式存在抵触心理,限制了消费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为此,应着重通过宣传教育倡导现代消费理念。当然,鼓励消费并不代表鼓励过度消费、盲目消费、跟风消费,要正确认识鼓励消费与合理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更加重视理性消费。其次,要加强对信用消费的金融支持和风险监控。数字金融的发展推动了超前消费和信用消费观念盛行,特别是新生代群体越来越崇尚超前消费和信用消费,已然成为拉动消费的生力军,但同时也催生了许多网络诈骗信贷现象,这就要求相关部门加强监管,尽快建立完善的企业和个人征信体系。再次,要促进消费形式多元化。数字经济时代,消费方式网络化、支付方式移动化特征凸显,应促进以网络代购、直播带货等为代表的新型消费模式的大力发展。同时也要加强监管,特别要严厉打击欺诈骗消费者的行为,包括欺骗和误导消费、恶意诱导捆绑式消费等,以净化消费环境、提高消费质量和消费安全感。另一方面,要努力提升供给体系对消费需求的适配性,引导投资结构趋于合理化。数字经济时代,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边界日趋模糊,“生产型消费”应运而生,生产者应借助大数据、云端融合等手段即时全面获取消费者的需求信息,并及时调整生产结构和投资结构,提前对市场进行科学合理分析,尽可能提高生产性消费的效率。

第五,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在更高水平上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首先,要继续深化“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加快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对等反制并非长久之计,有效应对美国螺旋式加征关税的核心就在于积极推进贸易多元化,与更多经济体建立经贸合作伙伴关系并扩大合作规模、提升合作质量。一方面,要始终秉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互联互通,尽最大可能扩大国家间的要素流通范围,提高流通速度;另一方面,要积极拓宽多边和区域经贸合作的覆盖面,充分发挥“一带一路”、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区域合作的引力效应以及中欧班列、国际贸易新通道等

的枢纽作用,吸引更多的国家加入中国经贸“朋友圈”。其次,要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示范引领作用。不仅要在更大程度上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自主发展、自主改革和自主创新的权限,发挥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优势,加快对成熟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推广,还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努力培育更加优质的开放新高地。最后,要加快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保障机制。要以坚决破除非关税贸易壁垒为重点,尽快完善对外开放的政策协调机制,特别是在财税、金融、产业、贸易等方面要加强政策的衔接性,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建立健全征信体系,严厉打击失信违规行为。同时,还应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提出更多中国倡议、中国方案。

#### 注释: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36页。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36、455页。

③具体推导过程详见徐志向、丁任重:《中国经济增长驱动因素识别研究——基于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的视阈》,《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年第2期。

④证明过程为:假设 $t_0$ 期两大部类社会总产品构成分别为 $C_1^0+V_1^0+M_1^0=Y_1^0$ 、 $C_2^0+V_2^0+M_2^0=Y_2^0$ ,且满足 $V_1^0+(1-x_1)M_1^0=C_2^0$ 。那么,在进行1期扩大再生产后,两大部类社会总产品构成分别变为 $C_1^1+\Delta C_1^1+V_1^1+\Delta V_1^1+(V_1^1+\Delta V_1^1)M_1^1=Y_1^1$ 、 $C_2^1+\Delta C_2^1+V_2^1+\Delta V_2^1/\partial_{II}+(V_2^1+\Delta V_2^1/\partial_{II})M_2^1=Y_2^1$ 。此时,在 $t_1$ 期便很容易推导出 $V_1^1+\Delta V_1^1+(1-x_1)(V_1^1+\Delta V_1^1)M_1^1 > C_2^1+\Delta C_2^1$ 的结论。

⑤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52页。

⑥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工人的工资是会全部用于消费必要生活资料的,即 $p=1$ 。但考虑到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工人必然也会存在消费奢侈品的一般情况。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下,在我国消费升级的现状下,工人阶级消费奢侈品也属正常现象,所以为了更好地指导我国的现实实践,此处设定 $0 < p \leq 1$ 。

⑦徐志向、丁任重:《中国经济增长驱动因素识别研究——基于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的视阈》,《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年第2期。

-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89页。
- ⑨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0页。
- ⑩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8页。
- ⑪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9页。
- ⑫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9页。
- 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43-144页。
- ⑭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23页。
- ⑮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7页。
- 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IV页。
- 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99页。
- ⑱贾康:《关于当前经济发展中的内循环的三点思考》,2020年9月8日, <http://finance.sina.com.cn/zt/china/2020-09-09/zt-iihvhuipp3192840.shtml>。
- ⑲张忠任:《数理政治经济学——原理、方法与问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368-373页。
- ⑳张忠任:《数理政治经济学——原理、方法与问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368-373页。
- ㉑赵峰、赵翌辰、李帮喜:《马克思两大部类模型与中国经济的宏观结构:一个经验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 ㉒赵峰、赵翌辰、李帮喜:《马克思两大部类模型与中国经济的宏观结构:一个经验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 ㉓王桂军、张辉、金田林:《中国经济质量发展的推动力:结构调整还是技术进步》,《经济学家》2020年第6期。
- ㉔黄群慧:《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产业发展与工业化进程》,《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9期。
- ㉕冯俏彬:《加快形成经济发展新格局》,《红旗文稿》2020年第18期。
- ㉖《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11页。
- ㉗逢锦聚:《马克思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的原理及其在经济新常态下的现实意义》,《经济学家》2016年第2期。
- ㉘按照“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的目标,2020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总体实现。参见亢舒:《2020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经济日报》2017年3月3日。
- ㉙丁任重、李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经济问题》2017年第1期。
- ㉚黄群慧、倪红福:《基于价值链理论的产业基础能力与产业链水平提升研究》,《经济体制改革》2020年第5期。
- ㉛洪银兴:《产业化创新及其驱动产业结构转向中高端的机制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5年第11期。
- ㉜黄蕙萍、缪子菊、袁野、李殊琦:《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及其中国参与度》,《管理世界》2020年第9期。
- 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2页。
- ㉞张杰、金岳:《我国扩大内需的政策演进、战略价值与改革突破口》,《改革》2020年第9期。
- ㉟文书洋、牟爽、刘锡良:《中国金融业利润过高了吗——基于马克思生息资本理论的分析与实证证据》,《经济学家》2020年第6期。
- ㊱方福前:《从消费率看中国消费潜力与实现路径》,《经济学家》2020年第8期。
- ㊲沈国兵:《疫情全球蔓延下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经贸发展的困境及纾解举措》,《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9期。
- ㊳戴建华:《科学把握新发展阶段》,《红旗文稿》2020年第18期。